

COLLECTION OF PEI FEI'S TREATISES

裴斐学术论文集

看不透的人生

裴斐 著

by PEI FEI



北京燕山出版社

看不透的人生

——裴斐学术论文集

裴 斐 著

北 京 燕 山 出 版 社

(京)新登字第209号

看不透的人生

裴斐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平原印刷厂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14.5 字数 300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486-9 / C · 0047

印数: 2000 册 定价: 8.00 元

前 言

原拟出两本书，现将两书合为一集。

十年来有关李杜论著，除《李白十论》，其余罄于此矣。另有赏析、今译、诗话及百科辞条若干，则一概未收。题为《卮言》，支离其言，言无的当之谓也。李杜之外，涉及普通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专题及各家研究之文字，题为《雌黄》，以其确有不同于前人及时贤之说，视为信口开河亦无不可也。

既曰卮言，复云雌黄，自毋须归类，但依发表先后顺序而已。顺此对北京燕山出版社扶持学术之义举谨表谢忱。

作者 1992 年 5 月

李杜卮言

目 录

李杜卮言

看不透的人生·····	(1)
贫病老丑话杜甫·····	(21)
“盛唐气象”再质疑·····	(32)
李白与月·····	(40)
太白乐府举隅·····	(49)
杜律举隅·····	(65)
杜诗风格与夔州风土·····	(83)
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	(102)
李集整理与新编献疑·····	(108)
李白与魏晋六朝诗人·····	(110)
“直挂云帆济沧海”解·····	(126)
太白乐府述要·····	(129)
李白年谱简编·····	(137)
怎样读李白诗·····	(155)
诗史与史诗·····	(160)
李白个性论·····	(163)
李白与历史人物·····	(181)
老杜之老·····	(212)
唐宋杜学四大观点述评·····	(215)
老杜之大·····	(231)
老杜之神·····	(243)

文苑雌黄

个性化是精神生产必须遵循的规律·····	(239)
中国古代爱情文学中的男与女·····	(246)
诗缘情辨(论纲)·····	(272)
文论商兑三题·····	(292)
比较研究与从“史”到“论”·····	(303)
白居易诗歌理论与实践之再认识·····	(305)
元稹简论·····	(309)
元白雌黄·····	(313)
再论关于元白的评价·····	(317)
附录:关于元白文学成就和“新乐府运动”的争鸣·····	
·····	(321)
别是一家词——论李清照·····	(330)
御用词臣的荣辱生涯·····	(341)
关于唐诗兴盛原因和“盛唐气象”的讨论·····	(348)
论作家品格和个性的实现·····	(367)
情理中和说质疑·····	(382)
孔子与汉民族文学传统·····	(397)
孔子与隐士·····	(400)
“看透”的看透·····	(402)
庖丁解牛的启示·····	(405)
从《论语》看孔子其人·····	(407)
言意之辨与“形象思维”及其他·····	(435)
“穷而后工”辨·····	(438)

看不透的人生

——纪念李白逝世一二二〇周年
暨杜甫诞生一二七〇周年

前期李杜

中国诗人有个普遍特点，那就是大器晚成。或问：李贺何如？曰：昌谷险奇怪僻，偶有佳句，终非大器。中华民族是个感情深沉的民族，要写出足以体现这种民族性格的诗篇，仅凭青年时代一点天才和热情怎么行？非有丰富的阅历和人生经验不可。

李白和杜甫，这两个最有资格代表我们民族性格的诗人，正是大器晚成的典型，他们开始得早，成熟得晚，主要成就都在后期。李白后期应由天宝三载（744）出宫算起，杜甫后期应由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算起；相去十一年，这不正好是李杜年龄之差么？人世间也真有如此凑巧的事：诗歌之国两个最伟大的代表不仅在同一时代相遇，而且都是到了四十四岁才进入创作的鼎盛时期。

再者，李杜思想创作又都经历过一次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而且都是发生在长安。他们都有很大的政治抱负，都想做一番安邦定国的辅弼大业。二人的个性差异，表现在选择的从政道路不同：杜是标准的正统派，“窃比稷与契”，立志做贤臣，其所采取的出仕方式亦与一般士子无异；李白不然，他梦想当策士，献奇策立奇功，一举而致卿相。就唐代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言，杜甫是现实主义者，李白则是脱离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在皇帝昏庸、奸相擅权的玄宗后期，当策士固然是梦想，当贤臣也同样没有出路。李杜从政均以悲剧告终，正是这个悲剧引起他们思想上的深刻变

化，促成日后创作上的大成功。这个变化过程，李白是用不到两年时间完成的，而杜甫却为之耗去整整十年。

进京以前，李白偶有言志之作，或自陈“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抱负，或发表“不待金门诏，空持宝剑游”（《寄淮南友人》）的牢骚。这类作品不多，却能撩开由许多游仙诗、饮酒诗和山水诗织成的迷雾，说明诗人各地漫游和广泛结交实为寻找政治出路。热衷功名是李白前期的主导思想，但他经常歌咏的却是高蹈忘机，这种看来矛盾的现象，只要结合道教盛行的社会情况及李白从政的独特途径，便不难理解。虽可理解，那些描写隐逸和游仙的作品本身实在乏善可述，举出《游泰山》六首就够了。如果说李白前期游仙诗要为表示高蹈忘机，同期饮酒诗则为表示狂放傲世；前者突出个“雅”字，后者突出个“狂”字。“狂”比“雅”更符合李白性格，因此他的饮酒诗总是比游仙诗写得真实生动。例如名篇《襄阳歌》，诗中以晋人山简自比，勾勒出一副佯狂放诞的自画像，就形象的鲜明性而言，实为前期诗中难得的佳作。佯狂放诞固然是李白性格的重要特征，但如果仅止于此，岂不成了个放大的山简？李白所以根本不同于刘伶、山简之流，在于他的佯狂放诞背后隐藏着极为深刻和充满矛盾的思想情绪；这要从后期饮酒诗中才能看出。李白前期写的最好的作品，还是不多几首抒发羁旅别情和歌咏山水的律、绝，如《渡荆门》、《黄鹤楼送孟浩然》、《望天门山》等。这类情融神会的写景小品，色调冲淡，在李白诗中别具一格，对于构成丰富多彩的李白诗歌宝库是不可缺少的，但毕竟并不代表典型的李白风格。代表典型李白风格的山水诗，还是后期所写气象巍峨规模宏远的作品，如《梦游天姥吟》、《望庐山瀑布》、《蜀道难》等。要之，李白的思想和艺术是到了后期才完全成熟的。文学是人学，即令山水诗，决定因素也仍然是人所经历的社会生活。

同李白相比，杜甫前期作品更要贫乏得多。在现存一千四百

五十七首杜诗当中，三十五岁入长安之前所写仅二十四首，这些作品或写景或咏物或纪游，竟无一首书怀言志之作。有趣的是，二十四岁那年便有过应举落第经历的杜甫，在他青年时代的作品中竟毫未流露其真实抱负，就连一点怀才不遇的牢骚也没有！相反倒时有出世之思：“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这自然是附庸时尚的违心之论，不可当真。较好的三首：《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虽属写景咏物，从中却不难看出诗人的心胸气魄，使人联想到“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晚年夔州诗《壮游》）时代的少年气盛的杜甫。这当然不是读者所熟悉的杜甫。

李杜殊途同归的长安悲剧，对于他们追求的人生理想来说是致命的打击，对于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却具有振聋发聩的启蒙作用。李白经过长期惨淡经营，终以布衣而名闻九重，由皇帝亲下诏令“征就金马”；“游说万乘苦不早”（《南陵别儿童入京》），他是怀着当策士的幻想进长安的。关于李白供奉翰林的实际情形，晚唐及五代人均竭力渲染其扶醉填词一类的事迹，其实据同代人李阳冰、魏颢等人记载，李白曾“潜草诏诰”（李阳冰《草堂集序》），“制出师诏”（魏颢《李翰林集序》），“上宣唐鸿猷”（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草答蕃书”（范传正《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与李白自云“早怀经济策，特受龙颜顾”（《赠溧阳宋少府陟》），“布衣侍丹墀，密勿草丝纶”（《赠崔司户文昆季》）相符，可见其入宫初期曾与闻国政。不过，据史载，当时李隆基本人已经“厌绳检”，对李林甫“任之不疑”（《新唐书·李林甫传》），他在李白入宫之初何以国政恐怕也是出于搪塞敷衍，加以同列谗害，李白在政治上遭疏是不可避免的。李隆基对李白“经济之才”不感兴趣，对他的诗才却很感兴趣，为榨取其灵感不惜“以水沃之”（李肇《国史补》），这对要“申管晏之谈”的李白真是莫大的讽刺！因此他只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与贺之章等人为八仙之游，以至“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赐金归之”（李阳冰《草堂集序》）。要言之，既不能当谋臣策士，又不愿当御用诗人，这就是李

白供奉翰林悲剧的症结。正是这个悲剧使他对宫廷腐败有了痛切的感受，为日后写作大量政治抒情诗打下了坚实基础。李白创作上的重大变化，从长安当时的作品中还看不出来。那些奉诏应制之作不必说，就是不多几首表明不得意的言怀之作，也无非流露出无可奈何的苦闷情绪罢了。较好的作品是《月下独酌》四首，诗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酒消愁的主题，同时贯穿着无法排遣的深深的孤独感；此实为诗人理想破灭而又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的真实反映，对于他当时置身的宫廷无疑是一种抗议。然而，若与其去朝之后所写《将进酒》相比，这种抗议就缺乏力量了。值得注意的是，李白这时凡吐露肺腑之言的作品无不属于“低调”，比后来杜甫在长安的调子更显压抑！隐忍压抑不合李白性格，只能由他的处境解释：翰林待诏的身份毕竟比“杜陵野老”显赫得多，而他后来屡次申诉的惧祸思想也就说明他当时在宫廷是深有所惧的。后世好心人杜撰出“命力士脱靴”的佳话，岂不知真实的李白却有点煞风景：当时的作品表明他在宫中是相当拘谨的。

李白的宫廷经历是个政治悲剧，若从物质外表上看，那种“朝天数换飞龙马”的生活，还是他一生当中最得意的时期呢。杜甫则不然，无论从什么角度看，他在长安的遭遇都是彻头彻尾的悲剧！入京翌年第二次应试，以李林甫阴谋竟无一人及第，这对杜甫是一次沉重打击，这时写出了《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此为杜集中第一首较有思想深度的陈情之作。诗中谈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破灭，谈到在长安“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悲惨境遇，进退徘徊，最后表示要离开长安。但他终于并没有离开，应试落第之后又不断赠诗各当津权要求其援引，并先后投《雕赋》，献《三大礼赋》，应试文章，进《封西岳赋》。当时他在长安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奏表》）的生活，“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一至“头白眼暗坐有胝，肉黄皮皱命如线”（《病后过王倚饮赠歌》）；正是这

种贫病交加的处境使他非谋得一官半职不可，“有儒愁饿死！”追求政治理想已变成一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也正是这种困苦难堪的生活地位使他接近社会下层，并对社会弊端有了深切的认识。《前出塞》九首和《兵车行》的出现，便说明诗人已由“致君尧舜上”的空想转到了体察民间疾苦的切实立场；而《丽人行》又从另一极端反映了天宝后期的社会真实。然而，象《兵车行》和《丽人行》这样的名篇，在以陈情述德之作为主的长安诗中毕竟是凤毛麟角！这时诗人的目光虽然已经转向社会，但主要兴趣仍在自己的功名前程，因此创作中出现的积极变化未得充分发展；而且创作精力也不旺盛，十年间存诗不足百首。杜甫创作上的真正飞跃是从他为仕途拼命奋斗结束时开始的；恰好安史之乱也在这时爆发。

李白的想当策士和杜甫的想当贤臣均以失败告终，正是这种失败使他们发热的头脑清醒，并由此获得对社会真象的正确认识。李白在长安厕身宫廷上层，因此洞悉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与腐败；杜甫虽然也曾接触宫廷权要，但毕竟身份卑微，加以长期仕途坎坷和贫病交集，使他更接近社会下层，并对社会弊端有更具体切实的认识。李杜长安经历的上述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日后创作的各自特色。

后期李白

当杜甫在长安为仕途拼命奋斗时，李白已进入了成就辉煌的后期。他一出长安便面目一新，《行路难》三首即其标志。诗中反复咏叹的歧路彷徨之感——垂钓碧溪，日边有梦——既表明了对现实的绝望，同时也反映出无法解决的思想矛盾：世途艰险，想弃世归隐，却又不愿放弃济世的理想；正是这种矛盾激起的感情波澜使人心惊魄动。“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悲感之极而以豪语出之，与前期“功业莫从

就”的哀叹何啻霄壤？而后期个人抒情所以深沉有力，就在于伴随着对政治现状的抨击和揭露：他没有出路是因为不愿与那些斗鸡赌狗之徒为伍。从《行路难》三首开始，怀才不遇即成为李白抒情诗中最常见的主题，其中多数均结合政治现实，具有政治抒情诗的性质。举其要者，如《鸣皋歌送岑征君》、《玉壶吟》、《雪谗诗赠友人》、《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赠宣城宇文太守》、《书情赠蔡舍人雄》以及《梁甫吟》、《远别离》等，便都是绝好的政治抒情诗，即都是把个人的怀才不遇归咎于现实的黑暗，在自鸣不平的同时对统治集团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和抨击：皇帝的昏庸，宫廷的腐败，当权者的自私、无能与凶残……“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书怀赠南陵常赞府》），诗人忧愤不已，并因此产生了大难将临的预感：“白日不照吾精诚，杞国无事忧天倾”（《梁甫吟》）、“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远别离》）！正是在这种黑云压顶、山雨欲来的时代气氛里，他发出了无比沉痛的呼声：“如或妄谈，昊天是殛”（《雪谗诗赠友人》）、“积蓄万古愤，向谁得开豁”（《赠别从甥高五》）。这类作品特别感人，还在于其中经常流露出“仙宫两无从”（《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的复杂心情，如《鸣皋歌送岑征君》云：“鸡聚族以争食，凤高飞而无邻”，这是表示不愿与宫廷权贵同流合污；可是下面接着又说：“吾诚不能学二子（巢由），沽名矫节以耀世兮，固将弃天地而遗身”，又不愿弃世归隐独善一身。正是这种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的人生态度，使李白性格闪烁出理想主义的光辉。李白诗中存在的矛盾只能由此理解，否则，如果根据某些挥斥幽愤之语便做出李白“飘然有超世之心”或“迷信神仙”的结论，便只能是對诗人的歪曲，再没有比这种结论更荒谬的了！恰恰相反，李白性格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对现实人生怀有无限的激情，否则他的矛盾、苦闷和忧愤便都不会产生。

前人每以豪放飘逸形容李白艺术个性，不为未见；但如果对

李白的了解仅止于此，则未免肤浅一些。李白诗的深刻性及其艺术魅力，关键还在它所具有的忧郁而愤怒的感情基调；不晓此不足以言李白。这种感情基调，前期所无，在后期却普遍存在，其源盖出于政治理想破灭所引起的思想矛盾；它不仅贯穿于如上所说的政治抒情诗，也贯穿于后期其它作品，从而使李白 前后期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特色。比如饮酒诗，前期名篇《襄阳歌》情调轻快，显示出放浪不羁的性格；长安所作《月下独酌》情调低回，流露出深深的孤独感和无法排遣的愁绪；而在以《将进酒》和《谢朓楼饯别》为代表的后期饮酒诗中，却出现了如黄河长江一样波涛翻滚的忧郁而愤怒的情绪，发出黄钟大吕般的砰訇之鸣。“但愿长醉不用醒”、“举杯浇愁愁更愁”，悲观至极，读之反使人振奋，原因就在这是诗人“天生我材必有用”、“俱怀逸兴壮思飞”的人生理想无法实现时对现实表示的抗议，是一个既不愿同流合污又不愿独善一身的人所抒发的愤懑。再如游仙诗和山水诗，这两类题材在李白诗中经常是相互交织的，但前期侧重神仙（例如《游泰山》六首），后期侧重山水（例如《梦游天姥吟》、《庐山谣》），感情色调亦大相径庭。如后期所作《西岳灵台歌》：“西岳灵台何壮哉，黄河如丝天上来”，气势何等雄伟，而诗中出现的仙人则可供人差遣：“明星玉女备酒扫，麻姑搔背指爪轻”，纯出戏谑口吻，与前期诗中诗人为之顶礼膜拜的“羽人”、“众仙”迥然异趣。前后期更重要的差别，还在于后期诗中时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一类激愤之语，使这类作品具有挥斥幽愤的性质。

忧郁而愤怒，这种贯彻于后期绝大部分作品的感情基调，既为诗人思想上无法解决的矛盾决定，同时也是时代投在诗人心灵上的阴影，惟其如此，他的自我抒情才能正确的反映那个时代。天宝年间的唐代社会表面上还呈现出盛世的假象，实则已经腐朽透顶的统治集团正在把国家引向灾难；满含忧愤的李白诗歌不仅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并具有政治预言的性质。同时代其他诗人——

包括杜甫（他正处于长安十年转折时期）——谁的作品也不具有这种深刻性。

安史之乱中的李杜

清人浦起龙称《自京赴奉先咏怀》为杜集“开头大文章”，可谓有识；我们不妨视之为杜甫前后期的分期标志。此诗作于天宝十四载冬，恰巧安禄山在范阳举兵反叛，也正好是杜甫十年功名恶梦终于结束的时候。当时安禄山叛乱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长安，但这篇色调浓重的巨制就象李白的《梁甫吟》和《远别离》一样充满山雨欲来的气息。不同者，李白出鬼入神的描写要为表达主观感受，杜诗则具有使人感到更加真切的客观性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既是安史之乱爆发时唐代社会的一幅真实缩影，同时这里面也包含诗人多年落魄以至幼子饿死的自身哀痛。此前杜诗中已出现忧国忧民之作，而自叹哀苦的陈情之作更多，但两类主题从未象现在这样和谐地交融在同一篇作品中。这种交融即意味着个人穷通与整个民族命运的相通，杜诗成为一部民族灾难的历史也正从此开始。“忧端齐终南，湏臾不可掇！”音响如此沉宏，不失为杜甫诗史的序曲。

不过，最先用诗歌反映安史之乱的不是杜甫而是远在南方的李白。早在长安沦陷之前半年，当安禄山在洛阳称帝时，这场历史浩劫便引起了李白的强烈反响：“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古风》其十九）、“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猛虎行》）、“洛阳三月飞胡沙，洛阳城中人怨嗟”（《扶风豪士歌》），诗言洛阳未及长安，其作当在安禄山陷洛阳而尚未入关时；诗中描写仅凭传闻及想象落笔，与杜甫名篇自不可同日而语，值得重视的是诗人的爱国激情。又《胡无人》：“敌可摧，旄头灭，履胡之肠涉胡血！悬胡青天上，埋胡紫塞旁；胡无人，汉道昌！”情绪激越无异抗战的号召；不仅如此，他还渴望亲身参与，故复云：“陛下之寿三千

霜，但歌大风云飞扬，安用猛士兮守四方？”跃跃欲试之心溢于言表，这就是他终于投入永王水军的缘故了。

杜甫毕竟缺乏李白的敏感，在潼关失守之前他对安史之乱虽早有所闻，“垂老恶闻战鼓悲，急觞为缓忧心捣”（《苏端薛复筵醉歌》），不过是忧时感事之中偶然涉及，显然并没有估计到这次战乱的分量；相反，他对镇守潼关的哥舒翰还有很大信心呢（《白水崔少府高斋二十韵》）。及至潼关失守，他自己也在乱离中被胡兵俘获又被送至长安，亲自体念到国破家亡的伤痛，这才创作出《哀王孙》、《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这一系列名篇。杜甫笔下的长安与李白笔下的洛阳，同样是在胡骑践踏之下，杜诗呈现的却是一幅幅情真景切的画面，有时诗人自己也出现在他所描绘的画面之中：“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不是自叙口吻，而是把自己也当作对象加以描写。杜诗与李诗差异往往就在这里。

当杜甫羁陷长安饮泣作歌时，李白正在永王水军中引吭高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如《永王东巡歌》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他对永王和对形势的看法都未免不切实际，那种处处以策士自任的作风甚至有点可笑，但他勇赴国难的坚决精神却具有严肃的性质。当永王以谋叛罪名被镇压时，李白于《南奔书怀》中自明心迹云：“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旋于浔阳狱中写出了名篇《百忧章》和《万愤词》。九土横溃，皇帝弃国逃跑，爱国者却成了南冠君子，以此他“万愤结缉，忧从中摧”，以至“泣血盈杯”、“泪血地而成泥”，不平之鸣殆无以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失败比上次从政失败对他的打击更大，但因为国难当头，他在愤怒指斥统治者“囚鸾宠鸡”的同时又大声呼吁营救，并继续寻找抗敌救国的出路，表现出空前的积极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半年后经宋若思等人营救出狱，立即便投入宋的幕府参谋军事（《中丞宋公脱余之囚参谋幕府因赠之》），随军到了武昌，并以宋

的名义向肃宗奏表自荐；此表不报，使他不得不离开宋的军队。但接着又赠诗宰相张镐陈情自荐：“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如此大声疾呼却仍毫无结果，终以从璘“免死流配”，这在唐代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这里附带说说：李白流放及释归前后每自称迁客逐臣，自比屈原贾谊，实则他比屈原贾更可悲，他是以布衣被逐被放！

当李白坐系浔阳狱时，杜甫已由长安潜投凤翔行在，“涕泪受拾遗”（《述怀》），不久便写下安史之乱中第二组名篇《北征》、《羌村》三首。无独有偶，《北征》与《自京赴奉先咏怀》，两篇鸿制不仅从内容到风格均相似（在杜甫诗史中堪称双璧），而且都是得官后回家探亲之作。两次得官，对杜甫都是苦尽甘来，或至少是厄运中一线生机吧？但这时他却把目光掉向充满危机和苦难的社会，因而诗中流露的情绪不是欢欣雀跃而是无比悲愤。二作相距两年，如果说《咏怀》通过国奢民病的描写已透露出大难将临的预兆，《北征》中国破人亡的悲惨景象便正好是预兆的应验了。又《北征》中关于亲人团聚的描写，尤其是对儿童情态的刻画，素为论家激赏，实为巨幅画卷中一个精彩的细部；而《羌村》三首则可视作此一细部的放大，虽然笔调清淡，近似陶、孟笔下的风情画，其所反映的却是乱世中的悲欢离合，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同样是杜甫诗史中的不朽名篇。诗中个人遭遇与社会景象错综交织，说明后期杜甫已把自己和整个社会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或不妨反过来说：因为他的个人命运已和整个社会联在一起，其所描写的个人遭遇也具有社会诗史的性质。长安收复后杜甫返京任左拾遗，半年后被贬华州司功。乾元元年冬到翌年春，战争形势好转，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在连拔安史据点之后，复以六十万重兵包围安庆绪困守的鄆城，在这种形势下杜甫写成《洗兵马》，此与后来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同为杜集中罕见的“快诗”。但鄆城决战并未获胜，反以关内大旱及九节度互相掣肘而大溃告终，这时杜甫